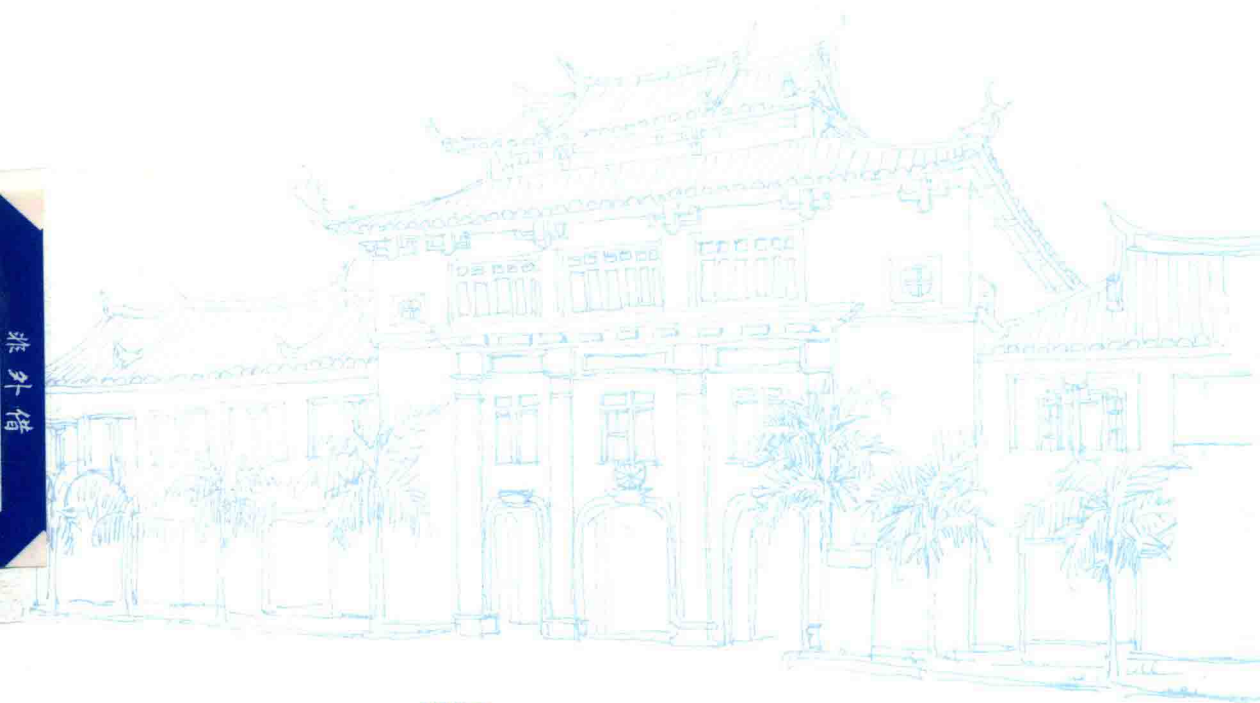


中国高等教育评论

★★★ 第10卷 ★★★

主编 / 潘懋元 史秋衡



科学出版社

《中国高等教育评论》系列由厦门大学高等教育发展研究中心资助

中国高等教育评论

★★★ 第10卷 ★★★

主编 / 潘懋元 史秋衡



科学出版社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高等教育评论. 第10卷 / 潘懋元, 史秋衡主编.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18.10

ISBN 978-7-03-059233-0

I. ①中… II. ①潘… ②史… III. ①高等教育-研究-中国
IV. ①G649.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241937号

责任编辑: 付 艳 崔文燕 / 责任校对: 王晓茜

责任印制: 张欣秀 / 封面设计: 楠竹文化

联系电话: 010-64033934

E-mail: fuyan@mail.sciencep.com

科学出版社 出版

北京东黄城根北街16号

邮政编码: 100717

<http://www.sciencep.com>

北京虎彩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印刷

科学出版社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

2018年10月第 一 版 开本: 720×1000 B5

2018年10月第一次印刷 印张: 18 插页: 2

字数: 280 000

定价: 89.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我社负责调换)

《中国高等教育评论》编委会

(按姓氏拼音排序)

陈玉琨 华东师范大学

顾明远 北京师范大学

刘海峰 厦门大学

潘懋元 厦门大学

史秋衡 厦门大学

王洪才 厦门大学

邬大光 厦门大学

吴康宁 南京师范大学

杨德广 上海师范大学

杨广云 厦门大学

钟秉林 北京师范大学

序

《中国高等教育评论》是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厦门大学高等教育发展研究中心和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主办的学术集刊。集刊依托厦门大学高教中心/教研院的高水准高等教育研究与交流平台，坚持“创新高等教育基本理论，探寻高等教育发展规律，研讨高等教育重大问题，深化高等教育体制改革”的基本原则，以高质量的中外高等教育理论研究为特色，探讨中外高等教育研究的前沿问题。

本卷包括三个学术专栏。第一专栏为高等教育发展，内容涉及通识教育、民办高等教育、留学教育、文莱高等教育等。第二专栏为现代大学制度，论文涉及高校分类设置、“世界一流大学”内涵疏解、高校办学自主权逻辑、高校内部质量保障体系构建等。第三专栏为高校教育教学与人才培养，包括研究生创新型人才培养、大学高层次人才竞争失序的反思及治理、研究生培养质量现状与问题反思、高校国防教育价值探究、美国社区学院学生发展的重设与评估、高校教师“双能”内涵与标准研究，以及高等学校自我评价中学生、教师与雇主的角色定位。

衷心感谢诸位专家学者不吝赐稿，他们关于高等教育发展、现代大学制度、高校教育教学与人才培养等的深入探讨，将有力推进中国高等教育理论与实践的快速发展。

目 录

——高等教育发展——

我国大学通识教育实施中面临的几个基本问题 / 王洪才 / 003

面向 2035：如何让民办高等教育更具生机与活力——以上海市为例

/ 董圣足 余国平 / 020

试析我国高等教育重点建设的不虞效应 / 贾永堂 李 娜 / 053

我国面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留学教育：现状、挑战与对策

/ 张继桥 刘宝存 / 090

民办学校收费改革的发展方向和政策建议 / 方建锋 / 106

独立后的文莱高等教育发展研究 / 陈璐蓉 / 119

——现代大学制度——

中国高校分类设置研究：现状、成因与对策 / 王保华 王 楠 / 131

“世界一流大学”的内涵疏解集释 / 田建荣 / 146

高校办学自主权的逻辑——阿什比的大学自治理论及其当代意义

/ 蒋 凯 朱彦臻 / 156

高校内部质量保障体系的构建与特色——以厦门大学为例

/ 乔连全 王佳慧 / 172

——高校教育教学与人才培养——

研究生创新型人才培养:加快政府管理体制改革的思考/汪霞/183

“双一流”建设中大学高层次人才竞争失序的反思及治理

/武毅英 杨冬/201

教育学研究生学术研究取向分析——基于五所大学“教育学原理”硕士

学位论文实证分析/易连云 毋改霞 邹太龙 王春华 郑婉秋/220

基于同向同行“课程思政”的高校国防教育价值探究/陆华/237

美国社区学院人才培养制度的重设与评估/文静/248

教学学术能力和科研学术能力:高校教师“双能”内涵与标准研究

/王菁华 郭春荣 李青合 楼文斌 楼茵/260

高等学校自我评价中学生、教师与雇主的角色定位/刘鑒/272

高等教育发展

我国大学通识教育实施中面临的几个基本问题^①

王洪才

摘 要：目前，我国有多所研究型大学都在开展通识教育改革试验，但效果究竟如何却很难预料，原因就在于人们对通识教育并未达成真正共识，特别是对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基础教育和文化素质教育的基本关系尚未理清，从而导致在实施过程中目标不明、措施不力的状况。面对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压力、网络时代的挑战和课程数量激增的矛盾及文化适应性等问题，通识教育该何去何从，值得学界认真思考。

关键词：通识教育 专业教育 基础教育 文化素质教育 文化适应性

一、通识教育为何进展不顺？

通识教育可谓是高等教育学界讨论经久不息的一个话题，而且中外大学关于通识教育实践也出现了不少共同趋势（陈廷柱，张静，2016）⁹⁸⁻¹⁰³，但实事求是地说，人们对通识教育的理解并未达成共识。虽然我国学术界对通识教育理念具有很高的认可度，而且不少研究型大学都把通识教育实践作为进行拔尖创新人才改革试验的重要方案来推行^②，但仍然无法消除对

^①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教育学重点课题“国家学历资历框架研究”（AKA160011）。

^② 如复旦大学设立复旦学院，中山大学设立博雅学院，北京大学设立元培学院，西安交通大学采用书院制，都是为了通过加强通识教育来培养创新人才。

通识教育理解的差别。从理论上讲,通识教育确实有助于培养拔尖创新人才,因为它致力于培养学生具有深厚的知识基础,培养学生具有较高的人文素质和较强的国际视野,特别是培养学生具有独立探究的能力,显然这对于培养创新人才是有利的,然而它在实践中的推进并不理想。为什么会如此?这就需要深入探究。

事实上,即使在通识教育的发源地美国,大学开展通识教育的进展也并不顺利,仅有少部分精英大学和一些专门的文理学院开展的通识教育实施相对成功一些,因为他们的目标在于造就全人而非专才(王晓阳,曹盛盛,2015)¹⁷⁻²⁵。而在多数大学,通识教育因为其非实用性而受到无形的抵制(王霞,2006)¹¹⁰⁻¹¹³。一般而言,当通识教育与大学的办学理念内在契合时,推行它就比较顺利,否则就很困难。之所以如此,原因在于这些精英大学有自己的文化底蕴,学术有自己的稳固权威,学生对学校的办学理念认同度比较高,而且他们对学术有自己的抱负,这样在学校与学生之间就达成了一种默契,可以说这是通识教育可以顺利推行的前提条件(张砚清,2015)⁶⁷⁻⁷⁰。而在其他大学,学生到此就读的主要原因是出于对职业的考虑,缺乏浓厚的学术兴趣,当然学校也缺乏浓厚的学术氛围,那么,推行通识教育就显得比较困难,这与中国绝大多数高校的情况是比较一致的。在美国,实施通识教育的主力实际上是那些小规模的四年限文理学院,因为他们始终坚持古典的文科教育理念,所以他们所标榜的不是所谓的通识教育,而是仍然源自古典的博雅教育或自由教育。众所周知,通识教育只是博雅教育的变种,而坚持博雅教育,就是对通识教育理念的支持。即使在那些精英大学,如哥伦比亚大学和芝加哥大学,特别是耶鲁大学,他们所信奉的仍然是博雅教育理念,而非如哈佛大学所提倡的通识教育。因为美国各大学非常注重自己的个性特色和历史传承,不会简单地“跟风跑”。而且美国大学之间始终都存在一种竞争性关系,没有人自动地把哪所大学奉为“老大”或甘拜下风,都坚持各有所长,即使哈佛大学也不敢以“老大”自居(张冲,2011)⁴³⁻⁴⁶。因此,美国各著名大学都坚持自己的办学理念,不会随意地改变自己的标识。即使那些比较一般的学院和大学也不会简单地“跟风跑”,这也是美国能够形成多样化高等教育系统的根本原因。

但无论是今日中国还是当下美国,整个社会的商业气息都是非常浓重

的,都高度注重实用性的知识和技能,而通识教育却是坚决反对实用主义的(哈里·李维斯,2007)¹⁻⁷,正因为如此,没有独立的学术风尚是无法推行通识教育的。从某种意义上讲,通识教育所追求的乃是一种无用之学,因为它的目标是培养自由人格,而非掌握实用技能,其所追求的是知识的解放价值而非知识的控制力量。无用之学,与带有商业气息的实用主义显然是南辕北辙的,但这恰恰是自由教育的实质,它经过洪堡的“无用之为大用”的解释后充满了魅力。^①对个体而言,能否接受这种教育理念,主要是看其志趣心向,并非适合于每个人,而这种志趣心向培养与个体的生长环境密切相关。必须指出的是,优雅的生活姿态不是随随便便就可以培养起来的,它需要依靠书香门第的传承才能延续下来。中国古代和近代不少名家的家学渊源深厚,往往能够培养这种气质,而在今天的大众化社会中,这种气质则非常稀缺,所以它自古以来就是一种贵族教育项目。只不过在西方追求的自由教育的旨趣是追求纯粹知识,通识教育的功效则在于培养人具有一种宽广的胸怀,塑造一种生活方式,未必就是追求纯粹知识本身(孙华,2015)³⁻¹³。众所周知,西方博雅教育最初含义就是一种爱智的教育,这样的教育追求的是广博的知识,从而探索人生的奥秘,因为只有在这种探索中,人才能获得充分自由。通识教育则不一样,它的主旨是打破文化壁垒,培养一种宽容的心态,从而能够适应西方社会所倡导的多元的民主生活。所以美国大学在推行通识教育时的具体主张是不一样的,如永恒主义教育理念所主张的仍然是传统博雅教育的精髓,即培养自由的人格;而哈佛大学的通识教育更多地追求传播西方文明,培养一种国际视野(哈佛大学通识教育工作组,2015)⁹⁵⁻¹⁰⁴;斯坦福大学的通识教育则更直接,希望培养人的批判性思维和国际化视野。由此观之,即使在美国大学,对通识教育也未形成统一的认识,在实践方式上也是多样的和多元的。

毋庸置疑,通识教育追求培养人具有宽广的胸怀,对于纯粹知识的探索是非常有利的,而通识教育更主要的目的在于培养人具有自由思考的品

① 蔡元培是洪堡大学理念的支持者,在他的领导下,北京大学专注于学而非术,主张学与术分离,故而工科被调整出北京大学。在高等教育历史上,永恒主义的重要代表人物赫钦斯就非常反对实用主义、职业主义。弗莱克斯纳也是洪堡大学理想的坚定支持者,也注重“无用之用”。参见:弗莱克斯纳. 2017-04-07. 无用知识的有用性[EB/OL]. http://www.360doc.com/content/17/0407/07/32905799_643515098.shtml [2018-02-12].

质,从而适应西方民主化生活的需要。在中国,历来都非常强调培养经世致用之才,对于无实用价值的玄学则是持鄙夷态度的。所以,今天在中国引入通识教育时就面临着文化适应性问题,这实际上就是一种创新与实用之间的关系问题。^①

在中国高等教育学术界,自从改革开放政策实施以来,关于通识教育的讨论一直没有停歇,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事情,而且它与本土提倡的文化素质教育构成了一个鲜明的二重奏,这也是以往几乎没有的事情,因此对该问题探个究竟非常有趣。为什么在中国通识教育会再次兴起,它与本土所提倡的文化素质教育之间是什么关系,它的未来发展方向会怎样,这些都值得深入讨论。本文仅从通识教育与文化素质教育比较的视角来考察通识教育的发展趋势^②,以便为未来高等教育改革发展提供借鉴。

二、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相对立吗?

通识教育之所以能够在中国学术界持久不断地被讨论(王洪才,解德渤,2015)²¹⁻²⁸,关键在于它是作为传统专业教育的对立面出现的(甘阳,2006)³⁸⁻⁶⁷。在现实中,人们发现专业教育存在着诸多不足,于是试图去改善它^③,此时自然而然会想到它的对立面,希望从中汲取智慧。那么,通识教育真的是专业教育的对立面吗?这事实上是存在很大争议的。从表面上看,通识教育代表全面的教育,致力于培养通用性人才,简称“通才”,而专业教育则是专门教育,致力于培养专门人才,简称“专才”,似乎两者是对立的。事实上,在专门教育实施过程中,没有一所大学是只教一门专业知识的,都是综合了多学科知识,如哲学、历史、管理、语言等,这些都成为大学生学习的基础课程。而通识教育也不排斥专业教育,因为通识教育是通过横跨多个专门课程进行的,而且鼓励学生对自己感兴趣的课程进

① 显然,完全照搬照抄美国大学的通识教育模式肯定不行,如何吸收其精髓为我所用才是根本。为此就需要对通识教育进行创新性理解。换言之,只有创新才能真正为我所用,不然永远存在一个文化阻隔。

② 从官方文件用语的变化,我们发现,在2010年之前,对“通识教育”的使用比较少,多使用“文化素质教育”一词。而在2010年之后,对通识教育概念的使用概率大大提升,“文化素质教育”一词基本上不再出现。这似乎说明通识教育概念更经得起考验,这似乎与国际化或美国化潮流有关。

③ 这个讨论在20世纪90年代形成了一个高峰,这与当时提出改革计划经济的趋势有关,与高等学校毕业生分配制度改革密切相关,同时也与专业培养计划调整具有密切联系。

行深入学习从而成为主修课程,即专业课程。因此,专业教育与通识教育的界限非常模糊,真正的区别可能是对学习广度和深度的要求不同。^①在专业教育中往往把广度课程当成非重要的课程了,造成了人们有意识地忽视它。而在通识教育中则要求广度课程学习必须达到一定水平,而且专业课程必须建立在广度课程基础上,即只有具备了一定的学习基础才能继续学习。所以,我国目前许多高校所实行的通识教育实际上仍然是过去的公共课模式,这个模式使之成为不重要的课程(熊耕,2012)⁷⁵⁻⁸¹。专业教育之所以使广度课程成为不重要课程,就在于一入学就进行了专业划分,虽然这个划分是有基础的,即以高考入学成绩为基础,但很明显这个划分做得太早,因为中学课程与大学课程之间的衔接是有限的。正是因为过早地划分了专业^②,才使学生兴趣变得专门化而缺乏广度了。美国大学由于在学生学习兴趣基础上进行专业划分,从而避免了过早专业化。这就保证了在课程学习上采取一视同仁态度,有可能采用深度的方式进行^③,这也是广度学习希望达到的目标。这个学习过程实际上就是一个自我探索过程,能够充分体验不同学科对自己的挑战,发现自己的真正兴趣所在,为专业学习打下基础。

但不容否认的是,在教育理念上,专业教育与通识教育是有本质区别的。专业教育的目的是培养在某一方面具有专深技能的人才,而通识教育的目的则是培养具有宽广视野的人,特别是具有批判思考能力的人。这也说明,实际上专业教育的培养目标是偏向应用型人才,而通识教育的培养目标是偏向理论型人才,因为只有具有理论思考能力的人才具有很强的批判能力。显然,这种批判能力是建立在具有广博的知识基础之上的。因为理论思维往往需要进行综合分析,只有具有广博的知识基础,才能使人具备综合分析能力,从而才具有更强的批判思考能力。

① 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的区别实际上是两种课程理念的区别,通识教育的理念是强调广而深,以兴趣为基础,目标是成人;专业教育的理念是专而精,以需要为导向,目标是成才。

② 今天仍在尝试的“大类招生”的实验方案的出发点就是如此,遗憾的是,很难突破专业教育的框框。因为专业教育中的冷热门专业划分比较明晰,而“大类招生”有模糊冷热门专业的嫌疑,这种模糊实际上是在回避市场选择的作用,但在现实中是不起作用的,因为大类招生之后仍然需要按照专业进行划分,人们的选择倾向仍然是热衷于热门专业,只不过这个时候是以学习成绩而非入学成绩进行划分而已。

③ 深度学习自然与教学方式有关,特别是与考试方式有关。一般而言,讲授法教学往往习惯于采用闭卷考试的方法进行测试,它往往容易鼓励学生进行浅层学习。

目前,还没有人完全否定专业教育的意义,而通识教育也不可能完全替代专业教育的地位,那么,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的对立是如何形成的呢?这主要是由学习者是否具有选择权决定的。专业教育是一入学就确定了专业方向,以后再转专业就非常困难,这样就把人的发展方向锁定了;而通识教育的专业方向是逐级分化形成的,是基于个体的自我发现,是自我探索的结果。从而在专业教育中人们的学习态度或多或少具有被动性,而在通识教育中人们的学习态度则是主动的。如在美国,大学本科前两年一般是接受通识教育并由本科生学院组织实施,课程是按大的学科领域进行设置,要求学生在不同学科选择一定比例的课程。在完成前两年的课程之后,再根据个人兴趣进入专业学院学习。所以,支持专业教育是计划经济逻辑,而通识教育所遵从的是市场经济逻辑。

我们知道,中国现行的高等教育模式的原型是从苏联引进的,它对中国迅速建立自己的高等教育体系及促进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发挥了巨大作用。但它的弊端则也非常明显,因为它完全是依照经济计划对专业、学科和学校进行设置的,所培养的人对口性强而适应面非常小,即不能完全满足社会经济发展变化的要求。由于它完全是根据经济部门划分设置的,所以教育完全成为经济部门的附属物,从而不能按照教育自身的规律发展,说到底,就是无法培养学生的独立性、自主性和创造性。因此,当计划经济模式无法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要求时,与之相应的高等教育模式也必须随之变革。

改革开放之后,中国高等教育重新学习美国模式,此时通识教育受到高度重视,因为人们认为通识教育是真正培养人的教育。我们知道,通识教育的理论根基是自由教育或博雅教育理念,它源于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的自由教育思想,构成了西方教育思想的底蕴。20世纪初期,大量留美和留欧学生的归国,也把这种西方教育理念带到了中国,从而对中国高等教育思想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可以说通识教育思想在当时颇为流行。基于这种历史的原因,今天人们对通识教育思想就有一种天然的亲近感。相反,人们对从苏联学来的专业培养模式则非常反感,认为这种培养模式所培养的都是些政治工具,不是独立的人,所以在教育界出现了“育人而非制器”的声音(杨叔子,2001)⁷⁻¹⁰。之前专业教育一直受到苏联教育成功

的光环的保护,所以人们对它的批评不多。随着中苏关系的恶化,人们对苏联教育模式开始了重新思考,但并未触动真正的教育体系设计。而苏联的解体则为高等教育模式的重新设计提供了机会,因为人们直觉地认为苏联模式是不成功的,无论苏联解体的缘由有多少,但教育体制肯定在其中发挥了一定作用,这一新思考与我国的市场经济改革要求获得了重合。尽管这一思考受政治因素影响而延迟了一段时间,但实行市场经济的趋势要求我们必须对高等教育模式进行重新设计。因为原来的培养模式是按照严格的专业划分设计的,而这种专业划分是与具体的产品联系在一起的。这种运行模式在经济不发达时期、高等教育机会非常短缺的时期是可以行得通的。在计划经济条件下,行业部门划分得非常细,那么专业设置也就非常细碎,培养的人才是对口式的,一旦要转换专业,之前所学的东西就不再适用了,必须重新开始学习。所以,在进入20世纪90年代之后,在高等教育领域检讨比较多的就是这种“对口式”的人才培养模式。于是,各高校开始探索新的人才培养模式,试图从拓宽专业口径、扩大知识面等方面进行突破。可以说,这个思路一直主导着我国高校改革发展的方向,直到今天依然如此,因为目前高等教育基本上仍然是沿循计划经济模式运转的。

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这种以市场需要为导向的高等教育改革推进力度应该说是非常大的。从宏观层面讲,部门办学的规模被大大压缩,办学权力开始向教育部门集中。在今天,教育部主管的学校和地方教育部门主管的学校毫无疑问是办学主体,只有少数不适宜归为教育部门管理的特殊类型高校才仍然保留原来的部门管理体制,如军事类院校和政治类院校。从中观层面说,教育部进行了多次专业目录修订和调整工作,大大地压缩了本科专业数量,从上千个本科专业缩小到300多种,最后到100多种,这些都是为了消除原来的专业设计过专、过细的弊端(汪晓村,鲍健强,池仁勇,等,2006)³²⁻³⁷。从微观层面看,一些高校开始实行大类招生,即不再一入学校就确定专业,而是在四年学习的中间阶段再进行专业划分,一般是在入学的第三年划分专业,前两年是进行厚基础、宽口径的教育。这三个层面的推进程度是大不相同的,一般而言,宏观层面的推进力度是比较大的,如明显地改变了多部门办学的状况,为之后的专业调整和整合

提供了基础;中观层面的推进相对容易一些,因为专业目录的调整几乎没有遇到什么阻力;而最难的则是微观层面的操作,因为这要求高校必须进行具体管理模式的变革才能适应,不然就很难改变。毕竟这仍然是一种自上而下的改革方式,并没有真正调动高校的自主性,高校的参与程度比较低,所以目前遭遇的困惑也比较多,成效也不显著,原因就在于如果上级管得太细的话,学校自身很难建立起主动的自我调节机制。换言之,要调动高校的自主性,改革集中管理方式是关键。

在对专业人才培养模式的反思中,人们关于人才规格进行了种种猜想,如培养复合型人才、T型人才或一专多能人才等。在讨论培养模式时,人们有意无意地回避了管理体制问题,因为这涉及权力分配和利益分割,难度比较大。但改革推进必然要与传统的管理模式产生冲突,具体而言,就是与课程设置的权限产生冲突。在传统课程量无法减少的情况下,要扩展学生的知识面就必须增加新的课程,结果使课程数目不断地扩大。今天,本科课程膨胀已经成为一个突出问题。

三、通识教育:基础教育的补偿机制?

如前所述,在新中国成立之前国内高等教育界就已经流行美国的通识教育理念,这似乎与当时的社会氛围有关。当时社会的变革思潮是追求科学与民主,那么教育的使命就是培养如同美国社会那样的自由公民,所以许多学校都推行通识教育。当然,一个更直接的原因是许多大学教授都是留美归国,这为推行美式教育主张提供了现成的资源。而在实行苏联教育模式之后,对通识教育的探讨就中断了。毋庸置疑,这与教育的政治倾向是联系在一起的。在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之后,高等教育学界再次开始探讨通识教育问题,即探讨通识教育对我国教育模式的适用性问题。但因为高等教育大的改革还没有真正开始,所以关于通识教育比较深入的探讨就非常少。当时的历史背景是:人们在思想上还没有完全解放,对流行于美国的教育思想还抱有几分戒心,因为在人们的下意识中,通识教育是资本主义的东西,是培养资本主义社会所需要的人才,与社会主义教育是格格不入的。另一个背景是:国内有一种论调,认为我们的基础教育比较扎实,